

奥斯陆谈判标志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尝试和解的历史性开端

化干戈为玉帛

——巴以首次和谈内情^①

◇刘旭东 编译

一、初晤

我于1993年5月14日下午接受了去奥斯陆谈判的使命。当时我的上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召我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官邸。我走进佩雷斯的起居室,只见他身穿一件羊毛衫,显得十分悠闲。精明能干的办公室主任阿维·基尔已坐在一张沙发上。我在佩雷斯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来杯酒吗?”佩雷斯问道。我点了点头。

“周末到奥斯陆去如何?”他不动声色地又问,那神态好似正在把乳酪和饼干放到我面前。“你说什么?”我竭力控制内心的冲动,问道。我知道去奥斯陆就意味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接触。在此之前,两位以色列教授耶尔·赫希菲尔德和罗恩·帕达克曾与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举行过非正式对话。

1993年5月20日,我离开以色列去挪威加入谈判小组。

我们的挪威主人,特尔耶·拉尔森,一家研究所的主任,在送我进入山区的路上向我灌输“奥斯陆精神”。他显然把我视为一名对眼前的使命过分拘谨的技术官僚。他说,幽默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互相交换观点不必那么正规。特尔耶认为,在奥斯陆举行的谈判,实质意义在于通过自己的自由思考而不是强硬的讨价还价来产生出解决方案。

在行驶一段时间后,我们到达一个属于挪威官方的小招待所——海夫塔宾馆。大家默默地坐下休息了几分钟。此时,传来了敲门声,特尔耶的夫人莫娜·朱尔走了进来。她身后跟着三名巴勒斯坦人。

“这是你的头号对手,阿赫迈德·库雷,即为人所熟知的阿布·阿拉。”特尔耶风趣地介绍道。

我对此人的外貌颇感意外。他正值中年,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却掩盖不住那深邃的目光。他穿着十分规矩,看上去更像一位欧洲国家的商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地下工作领导人。

“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互相寒暄着,同时意识到

我们之间的握手将具有史无前例的重大含义。房间里静了下来,随后特尔耶继续介绍:“这位是你的第二号对手,哈桑·阿苏福。”

阿苏福是阿拉法特亲密副手阿布·马赞(此人坐镇突尼斯监控这场谈判)的政治顾问。我感觉到他有一双闪烁的眼睛和不苟言笑的表情,似乎常常徘徊在两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之间:他既确信以色列是一个态度顽固、傲慢的政治实体,又坚信获得和解是可能实现的。

介绍给我的“第三号对手”是马赫·阿尔—库尔德。他个子高高的,性格直率,很有修养,使人联想起德国教师的形象。阿尔—库尔德在成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之前,确实曾在东德一所大学学习过。当罗恩·帕达克和耶尔·赫希菲尔德与三名巴勒斯坦代表拥抱之后,沉闷的气氛缓和了一些。他们之间已有五个月的交往了。

二、交锋

特尔耶随后领双方进入一间以木质材料为墙板的会客室中。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初次交谈显得颇为尴尬。

“我今天早上6点30分离开特拉维夫。”我首先说道。

“我们昨天离开突尼斯。”阿布·阿拉答道。

再往下大家都沉默无语。

挪威的夜晚是如此寂静。以色列代表团坐在一张狭长的木桌的对面,我开始宣读在后来持续三年的谈判中唯一的一次预备好的声明。这个声明包括拉宾总理和佩雷斯外长所坚持的两个条件。我首先强调:“耶路撒冷是我们民族的圣地,如果谈判涉及这一点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至于国际仲裁问题,你方必须决定我们双方是成为合作伙伴,通过对话来解决所有分歧,还是去寻求安理会式的那种仲裁方法,以致除了一大堆印有编号的决议文件之外毫无实际成果。”

我最后解释说,谈判应分阶段获得进展,第一步最好在加沙地带产生效果。“安全问题是我方强调的重点,你

①本文是巴以奥斯陆谈判中以方首席谈判代表尤里·萨维尔的回忆。——编注

方当然应该停止一切恐怖活动。双方也具有经济合作的潜力,我们必须把它转变成行动。”

我的结束语是:“这次谈判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历史机遇。”

扫视窗外,虽已是午夜,但太阳仍散射着淡淡的余晖。这时,阿布·阿拉开始了他的开场白。“我与我的同事以及在突尼斯的领导层非常高兴地看到谈判终于进入了正式阶段。我方已与我们的朋友耶尔和罗恩共同做了重要的工作。”(我此刻注意到耶尔和罗恩两人边记笔记边露出微笑。)
“我请你向你们的领导人转达我们,尤其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极其认真看待此事的意向。”

一听到阿拉法特这个长期以来象征着以色列敌对面的名字,我陡生一种怪异的心理。仿佛觉察到了我的内心世界,阿布·阿拉继续说道:“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参与,就不可能迈向和平的目标。没有任何其他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人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发言。”

“我们希望与你们和平共处”,他以严肃的口吻说道,“我们希望与你们合作开发这一区域,鼓励制定一个中东的‘马歇尔计划’;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可以向你们打开通向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也为我们自己打开通向自由的大门。被占领土地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是危急的。时间正在逐渐流逝。”

阿布·阿拉承认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然而允诺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至于我提出的两个实质性条件,他解释说 he 必须请示突尼斯总部。“不过有关安全问题,我已从阿拉法特那里获得特别指令,要在这件事上与你方充分合作。”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对我说:“告诉我,萨维尔先生,我听说以色列方面声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我想这样来理解:以色列是一个地区性强权,按照国际新闻界的报道,还拥有核力量。你们拥有这一地区最精良的空中力量,数量众多的坦克,世界上最有效的间谍网,以色列部队是最强大、最闻名的陆军之一。你们称我们为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称自己为仅拥有一些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手榴弹、吉普车和石头的自由战士。请向我解释一下,我们怎么会对你们构成现实的威胁,而不是相反呢?”

阿布·阿拉简洁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巴勒斯坦人是大卫,而以色列是歌利亚(大卫是《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打死了勇士歌利亚)。我顿时理解了巴勒斯坦人看待力

量对比的概念,正如他刚才叙述的:一个矮个子勇敢地征服一个巨人。由于多年来的战斗和冲突,各方都视自己为受害者。

我明确地反驳道:“你们之所以构成威胁,是因为你们想侵犯我的家园,我的房屋。”

“你是什么地方人?”他问道。

“耶路撒冷人。”我答道。

“我也是,”他脸色阴郁地继续问道,“你父亲生于何处?”

“德国。”

“我父亲生于耶路撒冷,现在仍住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祖父和他们的先辈的出生地?”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气愤,“我们能追溯到大卫王时代。我敢肯定,我们能为过去争论多年而无法达成一致看法。还是让我们看看为未来是否能找到共同点。”

“好吧。”阿布·阿拉咕哝道。

我们达成了互相之间的第一个谅解,决不再争辩过去。探讨未来意味着着眼于双方的现实,不去为先人所犯的错误争吵。

“我想回到你所提出的有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这一要点。”我一边说一边着手以恰当的比例画出以色列国土,所占领的土地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面积。“你们巴勒斯坦人拒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事实。从以色列新生的那天起,你们就联合整个阿拉伯世界向我们开战。”我用手指敲着地图说道,“这就是现实的生存空间对比。”我向后靠在椅子上,很满意自己提出的论点,在这场对抗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大卫。

阿布·阿拉很有条理地作了答复:“我相信我们已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已经懂得,拒绝承认你们将不会带给我们自由;你们也可以看到,你们对我们的控制也



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双方必须以和平、平等以及合作的方式生活在同一地区。这也是我方领导层的观点。”

“从原则上来说”，我以一种试图确立双方共同基础的态度说道，“我们需要分阶段地取得进展，使双方在和解、治安和经济方面渐进发展，从而为互相的关系创造一个新的氛围。我们需要的是一幅新的道路示意图以指引双方进入互相信任的领域。”

谈判双方站起身时已是清晨4点，大家握手之后走下楼，见到面带倦容的特尔耶和莫娜。这对夫妇一夜没睡，正耐心地等候我们。

“怎么样？”特尔耶谨慎地问道。

“没有讨论什么”，阿布·阿拉说道，“我们回住所去。”

“全结束了。”我耸了耸肩，补充道。

特尔耶迟疑了片刻，但我们以笑声消除了他的疑虑。这首次的短暂幽默引导我们经历了后来漫长的、有时是态度粗鲁的谈判。

三、父亲

莫娜和特尔耶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奥斯陆市中心参观一下，然后特尔耶开车送我到他家中。这座安宁城市的风光和主人的热情招待与我激烈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走上阳台，注视着透露出晨曦的奥斯陆。我想乘记忆犹新时考虑一下刚才几小时中的重要内容，不过思绪里却浮现出过世的父亲。

我的父亲莱昂·萨维尔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出色的知识分子，以色列外交部门的奠基人。从一开始，他就把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视为一场侵蚀以色列道德力量和人性的灾难。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呼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我父亲认为，与巴勒斯坦人谈判是检验以色列是否成熟的标志，而国内的某些负面思潮却害怕和谈，视和谈为“与魔鬼打交道”。例如，人们都知道前总理贝京就曾把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985年，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和谈的文章，我现在一直将它存放在我的手提箱中。父亲是我最近的人，此刻站在阳台上，我突然感到一种悲伤，我已不能告知他，我正在做他长期劝导去做的事。我有与父亲相同的志向，他如果知道，会感到欣慰的。

四、共识

第二天早饭过后，在去宾馆的路上，大家议论起昨天晚上呈现出的“融洽”气氛。与巴勒斯坦人相会后，

特尔耶建议阿布·阿拉和我两人单独在树林中散散步。我们沿着一条小道徜徉。阿布·阿拉告诉我，他昨天晚上会谈之后，一直在用电话向突尼斯方面请示汇报。他报告了自己对会谈的良好感觉。阿拉法特和阿布·马赞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即将东耶路撒冷暂时排除在谈判内容之外——尽管它肯定会在最后的解决方案中被重新提出来。我对这一迅速而明确的答复感到惊讶。阿布·阿拉表示，他也赞成在加沙地带先建立自治区的建议，但提醒说阿拉法特仍要求象征性地附加上杰里科——一座位于西岸的重要小镇。

我们随后谈起了个人情况。我告诉阿布·阿拉自己的家庭和我与佩雷斯共事的经历。他简略地叙述了他从耶路撒冷到海湾地区、东欧、贝鲁特、塞浦路斯和突尼斯的漫长历程。他提到妻子和四个孩子——一个在突尼斯，两个在欧洲，还有一个在美国。他还说起在阿拉法特那里度过的年代以及这位领导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奇特的工作习惯。

我们回到宾馆后，阿布·阿拉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原则性宣言。在浏览文件草案时，我对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建立经济联系方面的兴趣感到诧异。于是我概括地叙述了尽快改变现状的必备条件。阿布·阿拉对此给予了极其肯定的回应。

“被占领土上的形势是严峻的，它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剧烈动荡。”他说道，“我们必须给巴勒斯坦人民以希望。”

“确实如此”，我表示赞同，“可是这种希望必须与针对我们的暴力行动彻底分离。”

“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阿布·阿拉指出，“假如我们确实能获得一个与目前情况不同的前途的话，我们可以制止暴力事件发生。”这种希望与暴力之间的反比在整个和解进程中成为一种基本定势。“占领区人民的起义必定会产生政治效应”，他继续说道，“你们靠武力制服不了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显然没有看过那些报纸”，我隐含讽刺地反驳道，“现今的以色列政府并不想统治你们的人民。人权和占领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清楚这一点。但是也只有改变你们的态度，尤其是改变政治上的敌意和治安方面的对抗，才能产生本质性的变化。”

阿布·阿拉探身向前，严厉地盯着我，说道：“萨维尔，你应懂得，在与罗恩和耶尔的对话中，我们从自身立场上作出过历史性的重大让步——因为我们对于创造一个新的开端深感兴趣。不过阿拉法特难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要求作出妥协。”

“我以为我们已经同意不再进行讨（下转第43页）

普京当国家元首这件事本身，获得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这是俄罗斯 10 年来最可圈可点的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倡导的比如设立联邦专区等项国家改革，几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时至今日，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居民都最终解决了自己的国籍问题。当然，这不光是护照的问题，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到现在也不能适应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标志。被调查者的三分之二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公民，这一数字要比 10 年前高一倍。大约还有十分之一的人把自己与苏联联系在一起。世界主义者不多，但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哪国人。至于种族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已经很明了了。俄罗斯人以自己护照上第五栏“国籍”为自豪，这种感觉强于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公民”的称谓。

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对西方的好感已经削减多了。据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社会思潮社会学监测中心主任安德烈·安德烈耶夫称，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对待塞尔维亚战争的“双重政治标准”有关。就是在“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对美国明显表现出了同情，但对西方的好感也没有彻底恢复过来。俄罗斯人很谨慎小心地审视国外——现在几乎 40% 的俄罗斯人认为，战争威胁可能来自国外。社会学家认为，这并不说明俄罗斯人有危险的孤立主义的倾向性，只是人们对国外的新闻关心越来越少，而更关注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事情……

对政治不甚关心

(上接第 46 页)价还价了。”我说。

阿布·阿拉笑了起来。随后，耶尔提出一个巴勒斯坦方面在这场开创性谈判中倡导的要点：在双方的民众中创造和解的气氛，他将它概括为“和平宣传计划”。

“你知道”，我提醒阿布·阿拉，“按照大多数以色列人的观点，你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是一群恐怖主义者。”

阿布·阿拉针锋相对：“按照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观点，你们以色列是一个抢占我们土地的残暴压迫者。”

后来，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态从原则上同意，在双方的民众中致力于营造一种和解的环境。

五、誓言

在经过 1100 天的谈判并签订了三个协定之后，1993 年开始的和解进程使以色列社会出现了比党派

尽管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因为改革而有所失，但是仍有大约 40% 的俄罗斯人支持已经进行了 10 年的改革。针对俄罗斯的改革，谨慎的反对派占 41%，强烈的反对派占 18%。许多曾在 90 年代初期支持改革的人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然，社会学家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普京总统的支持率明显很高，而他本人还支持改革。参加此项调查的学者认为，俄罗斯人对“工具民主”——即社会对当局的现实影响程度，缺乏某种程度的关注。娜塔莉娅·季洪诺娃说，在自由和团结的价值取向上，俄罗斯更愿意选择自由价值观，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都是很谨慎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经常关心政治。

协助本次调查的德国社会学家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不会超过欧洲允许的意义”，艾伯特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彼得·舒尔茨博士警告道，“但是，欧洲和美洲在衡量国家元首的支持率时，同时还要把政党的支持率、可以保证政治领袖顺利渡过难关的社会政治体系的积极程度计算在内。在俄罗斯，人们对政党几乎没有兴趣。因此，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就像一辆在没有安装防护网的破路上行驶的汽车。缺乏政党和现实的工具民主的积极参与，这是当局的最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社会还没有走出转轨状态，而是在适应它。这个报告的作者们相信，出路并不遥远，或者已经完成了。至少在他们的报告中，现在的俄罗斯有时被坚定地称做“改革的俄罗斯”。

关系更深刻的分裂阵营，伊扎克·拉宾总理的被刺骇人听闻地展现了这一事实。有一半的以色列公众认为谈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而另一半则认为它使以色列在对抗暴力和外来社会价值观的渗透处于无防御的地位。在 1996 年的大选中，竞选双方获得的票数几乎相等。因此，这场争论必然要延续下去。

“我们仍然需要你和佩雷斯先生的帮助。”在几年后的一次私下谈话中阿布·阿拉对我说道，“佩雷斯被巴勒斯坦人视为世界级的领导人以及和平使者。你必须将我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

“我们将通过其他渠道为我们的信仰而奋斗”，我告诉他，“记住我们曾说过，‘奥斯陆要比它的反对者强大。你必须致力于维护奥斯陆精神’。”

阿布·阿拉握着我的手试图保持微笑。“只要我活着，就要为此而奋斗不息，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做”，他边说边放声大笑，然后补充了一句，“我想这是我们的誓言。”